

性别与 阴阳

中国十七世纪人情小说
性属主题研究

彭体春著

Gender and Yin-yang
A Study of Gender-Involved
Them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ese Worldly
Novels



本书由重庆科技学院资助出版

性別与阴阳

中国十七世纪人情小说性属主题研究

彭体春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与阴阳:中国 17 世纪人情小说主题
性属研究/彭体春著. —成都:巴蜀书社,2009. 6**

ISBN 978-7-80752-374-1

**I. 性… II. 彭…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明清时代 IV. I207.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8977 号

性别与阴阳:

中国 17 世纪人情小说主题性属研究 彭体春 著

责任编辑 李 嘉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2

字 数 28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374-1

定 价 30.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言

王晓路

外部世界的变化使得人类文化生活的层面随之发生悄然的变化。在中国前现代时期，抒情的歌谣，无论其形式如何多样，并如何被逐步地经典化，都与当时中国人群体的生存样式、精神存在和探索方式密不可分。然而就在欧洲发生大动荡的时期，国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尤其是其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点和辐射面，逐渐地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其中既有气候的变迁，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也与以农业为主的村落生活和不断上升的城镇生活相互交叉有关。单一的格律诗式的文学表述已难以再现这一生活的多重景象，也难以表征人们内心日益复杂的情愫。虽然中国的小说源泉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①，虽然其内在的结构及文字符号之编码也与神话、史传、传奇志怪和佛经

^① 参见石早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故事等口述和书写形式有着种种渊源关系，然而作为一种文类受到普通读者的喜好并引起学人的关注，确是后来的事情。城镇的不断出现与扩展、城市人口的增加与流动、茶楼说书的普及以及印刷的改进，都将这一新的文学现象不断汇集在人们难以回避的视线中，以至于演变为当代最为主要的文学形式。最为正统的诗歌则不断退位，成为小说章节中那些“有诗为证”式的作料。而中国小说从不入流到进入体制化的精英层面的历史，可谓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变的一个侧影。若对中国小说之“小”加以考察，必定是一件有趣的学术活动。

学界对中国小说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成绩斐然。各路方家或对其进行总体勾勒，或进行分期研究，纵向与横向交叉，理论与文本并行。其中既有对时间段的考察，亦有对小说家的分析。重要的论著诸如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大中文系的《中国小说史》、鲁德才《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论》、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吴功正《小说美学》、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方正耀著、郭豫适审订《中国小说批评史略》等等，不一而足。同时，这一领域也受到国际汉学界的重视，其研究成果也转而对国内学界产生了影响，形成了多层面的交流平台。其中尤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中国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研究成果影响巨大。陆大韦 (David L. Rolston)《解读中国小说》(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等系列著述以及日本学者内田道夫《中国小说世界》、小野四平《中国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研究》等均是汉学

界的重要成果。笔者也曾翻译过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小说和戏剧的总体研究情况^①。

在这样一种互为文化语境的学术视野中，人们将如何继续拓展这一“古老”的领域，如何深入挖掘其重要的文化资源，就成为学界重视的问题。其实，在这一领域，依然存在着许多有待发现、整理、归纳和比较的内容。彭体春君的这本论著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他通过详尽的考察，截取了 17 世纪作为自己的研究范围，虽然一个世纪还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段，但这一时间段的确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小说史十分有趣的一个时期。其次，彭君对该时期的小说创作主体和表征主体加以了特别的关注。中国 17 世纪处于社会变革的动荡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均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变。古老的阴阳关系所内蕴的社会性别即性属关系也在此期趋于复杂化，具体表现为在这个世纪出现了一批表征性属关系阴阳颠倒的人情小说，其中的社会性别/性属主题极为明显。虽然中国 17 世纪大量表征性属关系、尤其是反常性属关系的人情小说涌现，与 17 世纪之前的中国叙事对这一主题的表征有着直接关联，但 17 世纪对其表达更为集中和深入，在总体上的类型化叙述中也不乏更具创造性的思考。中国小说，尤其是古典小说的作者的身份和性别，一直是学界感到十分棘手的问题，研究成果也有不少。但对其创作主体和表征主体的性别，包括隐含的性别以及社会性别（性属）进行专门的考察，还

① 见《约翰斯·霍普金斯文学理论指南》中译本有关词条，即将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另见拙编（刘岩副主编）《北美汉学界的中国文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 年。

不多见。实际上，学界对中国 17 世纪所集中出现的这一大批人情小说中对性属关系的表征，也未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探讨。现有的某些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女性形象的分析而忽视这一问题之下的两性互动。有鉴于此，该论著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思考并讨论小说表征性属关系的叙事意图。其方法是将中国的阴阳理论与西方性属理论结合，既分析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也分析小说中的男性形象，用文本细读与文化分析相结合的问题研究范式，将中国 17 世纪人情小说中的性属主题置于中国文化语境下进行了有效研究。彭君以个案细读和分析为主，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醒世姻缘传》和《聊斋志异》中的部分作品以及《醋葫芦》、《金云翘传》、《豆棚闲话》、《无声戏》、《连城璧》、《禅真逸史》等等，并改写和采纳当代理论要素分别说明了文本中的性属类型。本著最终的结论为：中国 17 世纪人情小说中的性属主题表达并非以妖魔化女性为主要目的，在大部分作品中，丈夫和妻子都被嘲讽和谴责，男性与女性均被纳入性属机制，恢复阴阳“和谐”的性属关系是叙事者最主要的叙事目的。然而他指出，这一问题又不仅仅是性属问题，还隐喻着阴阳失调的社会秩序。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领域中，彭君的研究由此形成了有趣的论域。

多年以前，彭体春君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我在面试时觉得他在天津师大拿的硕士，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基础应当还不错，加之他十分诚恳，谦虚好学，对许多问题也有自己的想法，于是录取。他入学后，果然每日早出晚归，利用川大的图书馆，翻阅中文文献，查证西学相关论著，筚路蓝缕，刻苦努力，乃至顺利毕业。其后，每每听到他在单位为人低调，教学科研有成，自己

总是感到十分欣慰。现彭体春君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嘱我作序。而自己在这个假期过于忙乱，且事过多年，自己对其论文的详情也已有些淡忘，仅凭印象，做此短序而已。希望彭君将此作为学术的新起点，持续努力下去。

是为序。

2009年春于四川大学

目 录

序言	(1)
导论	(1)
一、研究价值及范围限定	(1)
(一) 中国 17 世纪人情小说	(1)
(二) 中国 17 世纪性属问题与中国 17 世纪人情小说 中的性属	(8)
二、研究理论和方法	(12)
三、研究现状	(30)
(一) 国内研究	(30)
(二) 美国汉学界相关研究	(36)
第一章 颠倒的性属	(41)
第一节 中国 17 世纪人情小说的性属主题回溯	(41)
第二节 中国 17 世纪人情小说中的性属角色	(60)
第三节 中国 17 世纪人情小说中的性属关系	(95)
第二章 《醒世姻缘传》等小说的性属主题	(111)
第一节 性属角色反常——泼悍之妻	(111)

第二节 性属角色的调正——治悍	(139)
第三节 性属调正失败——女教的尴尬	(155)
第四节 性属角色反常——惧内之夫	(168)
第三章 《醋葫芦》等小说的性属主题	(188)
第一节 论嫉妒	(188)
第二节 《醋葫芦》等小说中的性属关系	(203)
第三节 《介之推火封妒妇》和《江城》中的性属关系	
	(234)
第四章 中国 17 世纪人情小说的性属表征	(268)
一、阴阳关联的性属建构	(268)
二、阴阳和谐的性属理想	(275)
三、阴阳失调的性别隐喻	(287)
附录一：性属理论的中国“旅行”	(300)
附录二：美国汉学界对中国 17 世纪小说的性属研究范式分析	
	(317)
主要参考文献	(360)
后记	(374)

导 论

一、研究价值及范围限定

(一) 中国 17 世纪人情小说

史学界通常将万历之后至南明灭亡这一时段称为晚明，将顺治朝至康熙朝称为清初。有人主张将明末清初断为 17 世纪：“从纪年而言，为 17 世纪初年到 17 世纪末期，跨越近一百年的时间”、“我所说的明末清初学者所处的时期，是指公元 17 世纪，即明万历三十年以后，到清康熙四十年左右（1602—1702）这百

年中”^①。本文采用的明末清初这种时间分段，主要指 17 世纪。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期。新观念与旧思想交织、死亡与新生共至、动荡与繁荣并存。内在的文化品质，使之可以作为一个单独时期成为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对象。17 世纪小说研究因此成为明末清初社会转型研究的组成部分。

中国小说最初的文类地位不高。宋代话本小说虽然非常繁荣，但据谭正璧、胡士莹等考证，仅有二十余人的三十五至四十余种话本小说流传至今，散见于明代所编的《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京本通俗小说》、《熊龙峰小说四种》等版本中。但可见的宋人小说已经或多或少地经过明人加工，究竟有哪些小说为宋人原创，又有哪些小说为明人加工改写，已经很难分辨了^②。

明代小说的繁荣在 17 世纪真正形成。“嘉靖以后，小说，戏曲得到了发展。到了万历时期，创作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多，而且取材也比较广。”^③ 陈大康也认为 17 世纪才是小说的繁荣期：“就目前所知，从嘉靖元年（1522）至万历十九年（1591）这七十年间，新出的通俗小说有八种，而在万历二十年（1592）至泰昌元年（1620）的二十九年中，却出了五十种左右，两相比较，

① 文中所引两处分别来自孙立《明末清初诗论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3 页；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 页。此外还可参见李忠明《17 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年；许振东《步入巅峰——以 17 世纪苏州地区白话小说的创作传播为中心》，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何谷理（Robert Hegel）和赫思尼（Richard Hessney）等人关于 17 世纪的界定，可见 Robert Hegel, *The Novel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1981 ; Richard Hessney, *Beautiful, Talented and Braves :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Scholar-Beauty Romance*, Ph. D. dis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 1979 .

② 参见萧欣桥、刘福元《话本小说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195—197 页。

③ 赵景云《中国明代文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0 页。

后者新出作品的速率竟高出前者十余倍……最早的拟话本估计也产生于万历末年。就创作水准而言，《西游记》与《金瓶梅》可算是明代通俗小说创作的另一高碑，虽然关于这两部小说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但它们在万历朝开始较广泛地流传并对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① 石昌渝关注了此期的话本小说：“嘉靖以后话本小说才走出低谷，到万历、崇祯发展到高峰。”^② 孙楷第则关注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明末才有，也以明末为最盛。”^③ 清代小说的发展紧承明末小说而来，如清初盛行的才子佳人小说在明末即已出现。

有学者估计，明清时期“世情”小说可能有一千六百种之多^④，笔者根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提要》统计，明清时期创作通俗小说约一千部以上。其中明代至少为两百部，多成于万历之后的明末。清初则有一百余部^⑤。17世纪合计重刻或新出小说两百部以上，其数量不可谓不大。此期小说不仅对宋元小说题材重新予以发挥，而且也虚构了很多题材，对后世的《红楼梦》、清末谴责小说等一批有重要影响的小说均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小说传播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游国恩等从刻书角度对此期小说进行了描述：“嘉靖、万历两朝是明代刻书的极盛时代。万历时期的南京已成为大量刊行小说、戏曲和彩色套印的中心。这为

①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②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第236页。

③ 孙楷第《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上海：棠棣出版社，1953年，第1页。

④ 周季胜《明清艳情小说丛书·前言》，见《株林野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前言》第1页。

⑤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第30—450页。

当时小说、戏曲及其他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①公元 1600—1700 年间的 100 年内，刻书数量多达二百三十七部^②。一些书坊在南京、杭州、成都各地极富盛名，文人如冯梦龙等与书坊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一些小说作者、辑者、刊者或评点者本人即是书商。

小说评点同样在此期达到顶峰。“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小说评点家，几乎都出现于这一时期。以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为代表（包括李贽、叶昼、冯梦龙、李渔等人），在各种序、跋及评点文字中集中讨论了中国古代小说许多方面的问题，总结了小说创作的经验教训，概括出许多的作法、读法，为其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上的准备。”^③

尽管如此，由于 17 世纪小说介于此前的《金瓶梅》、《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和此后的《红楼梦》等著名小说之间，其地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在 17 世纪小说中，人情小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写情小说，永古不能磨灭者也，世界上有二人以上之相处，即不能无相互之情。至于男女之间，则尤甚焉。”^④ 人情小说作为小说类别之一，缘于鲁迅的分类。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按小说题材及其来源将明代小说分为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世情小说）、拟宋世人小说，将清代小说分为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

①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编《中国文学史》（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 6 页。

② 李忠明《17 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22—263 页。

③ 同上，第 6 页。

④ 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见黄霖、韩同文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478 页。

人情小说、文人小说（以小说见才学者）、淫狎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①。在《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中又以神魔小说与世情小说为明代小说两大主潮，以拟古小说、讽刺小说、世情小说、侠义小说为清代小说四大流派^②。从鲁迅的论证可以发现，人情小说无论在明代还是清代均为重要一支。对人情小说（世情小说），鲁迅从题材上作出如下分析：“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③ 学术界对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这一称谓，大多沿用了鲁迅称谓，侯忠义在对明代小说分类时也使用了世情小说这一称谓。他认为，明代小说按体制可分为长篇章回小说、短篇话本小说，从语体上分为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其中白话小说按反映的内容可分为：世情小说、历史小说、神怪小说、公案小说、话本小说等；文言小说可分为：传奇类、志怪类、笔记类轶事小说^④。

不过鲁迅的这种分类似有可论^⑤。因为他一方面分出人情小说，但又把“三言”、“二拍”等同样反映“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描摹世态”的小说分到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华山编《鲁迅作品精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105—231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华山编《鲁迅作品精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338、343页。

^③ 同①，第148页。

^④ 侯忠义编《明代小说辑刊》（第一辑），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总序》第2—4页。

^⑤ 吴燕娜（Yenna Wu）就认为鲁迅的分类标准显然是复合标准。See Yenna Wu, *Ameliorative satire and the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novel , Xinghis Yinyuan Zhan-marriage as retribution awakening the world*, Lewiston :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99, p. 25.

了人情小说之外的拟宋世人小说。有人主张应根据题材是否以反映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和世态人情，是否将家庭婚姻与社会世态融合这一点，将人情小说与讲史演义、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言情小说相区分。因为讲史演义主要书写英雄故事，重在写史；神魔小说少言人事，主要反映灵怪。而若命名为世情小说其外延过大，包含了有着特定称谓的“谴责小说”、“讽刺小说”（反映婚姻家庭和世态人情的人情小说当然也有讽谕色彩，但不以讽谕作为明显目的），若命名为言情小说则外延过小，容易给人形成专写情爱的误觉。以人情小说命名此类小说较为恰当^①。

马克梦 (R. Keith McMahon) 从题材上对人情小说进行了具体说明：“它的原意是‘有关人的境遇的小说’，所强调的是一个‘情’。这一类小说涵盖面广，故事主题包括了爱情、艳遇、婚姻、家庭生活、养儿育女（不包括历史演义、武侠小说或公案小说，当然，它们也包括一些性研究的素材，而且，有些小说如果没有它们作主题也可以称得上是人情小说）。”^② 在具体的研究中，马克梦将“纯情”小说、“言情”小说、“色情”小说均归入到了这种人情小说之中。

本书非小说史研究，所谓“人情小说”指从题材和内容上以反映市井生活、婚姻家庭、世态人情为主要内容的小说，部分神魔小说中涉及人情部分也进入本书论域。

17 世纪人情小说不仅与此期其他题材的小说一起建立了 17

① 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说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9—10 页；齐浚《明清社会思潮与人情小说性爱观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绪论》第 1—2 页。

② (美) 马克梦《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性与男女关系》，王维东、杨彩霞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 页。

世纪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即便将其同此期其他题材的小说相比，其重要性也是极为突出的。

首先，表现在数量较广。17世纪有通俗小说近三百部，刻书约二百三十七种^①。

其次，表现为地位升高。这种地位的升高由文人的重视可以得到体现。浦安迪（Andrew Plaks）认为此前出现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均由文人创作^②，这些小说的广泛传播与评点出现在此期，也从侧面说明小说在此期已经引起了文人的重视。与此同时，冯梦龙、凌濛初、李渔、徐震等人参与到了人情小说创作或辑刊中。文人参与到通俗小说创作或辑刊中，不仅提高了通俗小说的地位，而且还对小说的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互动明显。此期小说刊刻极为繁荣，出现了一些经济实力雄厚、影响较大的书坊。部分小说更是一刻再刻，还出现了大量伪托之作。据证，冯梦龙、凌濛初、李渔等人的名号均成为借托的热点，这也反映出人情小说在当时几乎供不应求。17世纪有几种题材的人情小说几至泛滥的地步，一为后来称为才子佳人小说类的人情小说，一为后被称为淫狎小说类的人情小说。类似题材反复出现，情节渐渐雷同，其原因可能并不仅仅在于小说写手的身份卑微和写作水平的低下，应该和当时这些小说受欢迎程度有很大关系。17世纪人情小说在当时社会（至少在中上层

^① 李忠明《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263页。

^② （美）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沈亨寿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